

「日本雕刻的近代」系列翻譯（三） 國家與雕刻*

Best Literature Excerpts Translated
Nation and Sculpture

古田亮 / 著
Author: Ryo Furuta

東京藝術大學大學美術館副教授
Associate Professor, The University Art
Museum, Tokyo University of the Arts

白適銘 / 譯
Translator: Shih-Ming Pai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教授
Professor, Department of Fine Arts,
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

* 本文原文為〈國家と彫刻〉收錄於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、三重縣立美術館與宮城縣美術館編，《日本彫刻の近代〔日本雕刻的近代〕》（京都：淡交社，2007），頁 65-71。

在第一章中，筆者已經針對在自幕府末期到明治中期的近代日本美術的形成期中，所謂雕刻這樣的概念是如何發展成熟的過程，透過高村光雲這樣一位雕刻家的關注，進行了追蹤。接下來的本章，將以所謂明治二〇年代到三〇年代，剛好是日本逐漸確立近代國家體制這樣的時期為中心，對近代雕刻顯露其一大特徵的問題予以關注。也就是說，所謂雕刻應該具備何種內容的問題，在明治國家的大框架之中而被檢視的事，在此應該成為重要的觀點吧！當然，這並不只限於雕刻，而可以說是針對美術全體的問題，不過，雕刻這種藝術的既有情況，和繪畫或工藝相較，即便認為其與公共性或社會性具有更為深遠的關聯，我們也無法忽視這個時代的雕刻在與「近代國家」的相關關係中成立的事。只是，在本文中，筆者對於國家這樣的概念，並不打算透過字面意義來考慮，而打算要以諸如國家式的有用性，或做為所謂近代國家中的公共性等更為寬廣的概念，來加以掌握。

近代國家與大作主義

首先，如果我們要從近代國家形成的觀點，對明治二〇年代（1887-1896）是什麼樣的時代進行概觀的話，則必須先舉出根據保安條例（明治二十年）藉以持續鎮壓反政府運動而成立的大日本帝國憲法發布（明治二十二年）的問題。與其具有連動關係的第一通常會議的召開（明治二十三年），則成為近代帝國主義國家中政治確立的巨大基礎。此外，教育敕語的發布（明治二十三年），更為規範日本人思想、精神般的、以天皇為中心的道德觀，奠定根基。

作為極端歐化主義反動的國粹主義式風潮，伴隨著如雜誌《日本人》（明治二十一年創刊）或報紙《日本》（明治二十二年創刊）等媒體的發行，而逐漸興盛起來。

如此地，在國家全體可以說是正處於擁有單一方向性的時代中，1889（明治二十二）年，美術雜誌《國華》被刊行了。當時美術界的領導人岡倉天心，以〈夫美術乃國之精華也〉一文，為該雜誌撰寫了「發刊辭」。文章之中，具有應該說是雕刻目的論的部分，令人感到興味盎然。天心在該部分，認為明治維新之後的美術獎勵政策，盡是些因應海外需要而來的貿易中心政策，故而倡導說今後必須「開展國民公共之獎勵」，關於雕刻，更提出以下的看法（引用之處，將原文改寫為現代日文）：

現今的雕刻，除了二、三位名家之外，大體上，若非拙劣的佛像匠師，即是庸俗的建築木工；若非精巧的象牙匠師，亦不過是品味低下的根付雕刻師而已。都是一些尚未能創造大作的一群。據此，我們不得不鼓吹雕刻旨趣及材料上的擴充。一如平安時代的雕刻師定朝般，如果具有製造佛像的精神的話，那就必須將其運用於忠臣義士的肖像之上；如果具有裝飾伽藍的巧手的話，那就必須用來裝飾公堂及公園。根據傳聞，我最近聽說皇居正門外要設置中世以來的歷史名臣銅像，或是可以代表國家體制的想像上的人物銅像。此外，據聞有人抱持著想要雕造成就明治中興偉業的國家元勳肖像，並將之傳於後世的計畫。